

东方巨人

毛泽东

EASTERN GREAT EMINENCE
MAO ZE DONG
解放军出版社 主编 李捷 于俊道
DONGFANGJURENMAOZEDONG

6 卷

东方巨人毛泽东

(第六卷)

主 编 李 捷 于俊道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主 编：李 捷 于俊道

副主编：毛国强 王红续 孙 刚

编 委：李 捷 于俊道 毛国强 王红续
孙 刚 龙润霞 王彩琴

编务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刚	丁子明	力 玉	力 威
大 鹏	巴 凤	王 岚	王成秀
方维钢	正 龙	汉 桥	叶绩辉
齐 芝	江 平	全 道	刘 畅
刘京明	刘前明	秀 芳	学 清
杨 铭	吴振山	肖 文	肖 坤
肖 娟	邹 洋	匡琼德	张国秀
张丽英	苑彦艳	尚 道	周之士
周意人	周嘉琪	胡少玉	欧 阳
闻 辉	俞 晔	梁旺芝	梁晓村
恩 阳	菊 华	道 珍	董玉君
静 静	鹏 程		

目 录

(第六卷)

第六编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出访苏联…………… (3)

“一边倒”格局…………… (3)

两个巨人的会晤 …………… (12)

柳暗花明 …………… (21)

满载而归 …………… (34)

二、“谈笑凯歌还” …………… (65)

又一场“淮海战役” …………… (65)

七届三中全会 …………… (78)

调整工商业 …………… (90)

指导新区土地改革 …………… (97)

抗美援朝…………… (125)

镇压反革命运动…………… (175)

发动“三反”、“五反”运动…………… (182)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204)

三、创造新世界…………… (233)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233)

农村的社会变革…………… (250)

和平赎买政策…………… (311)

指导“一五”建设和手工业改造…………… (337)

高饶事件…………… (371)

根本大法的诞生…………… (391)

在文化思想战线上…………… (408)

四、新的追求与探索…………… (437)

农业发展纲要…………… (437)

“双百”方针…………… (440)

十大关系…………… (453)

中共“八大”前后…………… (486)

两类矛盾学说…………… (504)

第 六 编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出访苏联

“一边倒”格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致函各国政府。10月2日，苏联政府决定与新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

毛泽东毕生只出过两次国，而且去的都是苏联。一次是在建国初，一次是在195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举行后不久，历时近3个月访问苏联，其意义极其重大。这是对“一边倒”外交战略方针的切实贯彻。

关于“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形成过程，薄一波回忆说：

“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所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蒋介石国民党要内战、独裁，就要卖国，就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为了企图控制中国，也必然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对我们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有利的。国、共双方，犹如两个人打架，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刹了国民党的威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

一、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两党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作者注）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

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 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3 月 25 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团员有高岗、王稼祥）访苏，6 月 26 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8 日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会见刘、高、王，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7 月 4 日和 6 日，中共代表团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专家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在莫斯科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7 月 11 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增进两党关系问题。15 日至 26 日，代表团与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负责同志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27 日，刘、高、王与斯大林、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商谈军事计划。30 日，少奇同志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8 月 2 日，毛主席电请少奇同志回国，参加

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组建工作。9日，刘亚楼、张学思同志抵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14日，少奇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出访任务，乘专列离莫斯科回国（近百名苏联援华专家同行）。

二、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为了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同时，也是为了奠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为什么当时要提出这样的外交战略方针？它的背景和针对性是什么？有何深远意义？当时正在华东指挥作战的邓小平同志于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论述今天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青年同志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转录如下：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

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三、建国初期，毛主席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作者注）同日，周恩来外长致函各国政府。2日，苏联政府决定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同志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当时，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21日，毛主席在

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大会上致词，全场三次起立。22 日，毛主席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 23 或 24 日谈一次”。恰在这时（1949 年 12 月 24 日），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苏联后，一段时间内，苏方不够主动，毛主席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毛主席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谈判，并将科瓦廖夫总顾问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仍有些猜疑尚未完全解开）。1950 年 1 月 2 日，毛主席致电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4 至 16 日，毛主席访问了列宁格勒。20 日，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等抵莫斯科。22 日，毛主席、周总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23 日，周总理和王稼祥、李富春同志同米高

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在毛主席主持下由周总理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5日，电请中央讨论。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莫斯科签字。同时，还签定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离莫斯科回国。

记得毛主席回国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曾谈到在苏期间向斯大林汇报了我们工作的情况，并传达了斯大林的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益，否则是危险的。二是建议我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三是建议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随后，4月11日，毛主席又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条约。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

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我想，了解了这些，就会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为什么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跟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为什么说这些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1]

关于决定毛泽东访苏的任务及准备工作，师哲作了如下叙述：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者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

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原因是订货者一而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2]

中共中央在作出毛泽东访苏的决定后，就请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让后者决定毛泽东去莫斯科的时间等。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王稼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中 央

11月9日

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菲里波夫^[3]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访苏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对斯大林寿礼的准备也作了细致安排。如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为此专门给山东分局发了电报：

山东分局：

斯大林同志今年 12 月 21 日 70 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 3 日内（即 12 月 4 日以前）购买每样 5000 斤共 2 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 12 月 4 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中 央

12 月 1 日下午 5 时

两个巨人的会晤

大约是 1949 年 12 月 6 日，毛泽东偕陈伯达（以教授身份）、师哲（翻译）等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专列沿途警戒是十分严密的。列车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线上发现一颗手榴弹（实际上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当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不久调外交部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并随周恩来访苏。）回忆了他负责的东北沿线警戒情形：

1949 年底，我又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毛主席坐火车赴苏联，参加斯大林 70 诞辰的庆祝活动和进行中苏会谈，我负责东北境内自山海关到满洲里铁路全线的警戒工作。由东北军区和铁道部共同组织，在沿线每隔一百米距离设一哨兵，互相都能看到。这样，每 1 公里 10 人，100 公里就 1000 人，全线共有几万人参加警卫，以免发生意外。如果专车发生了问题，